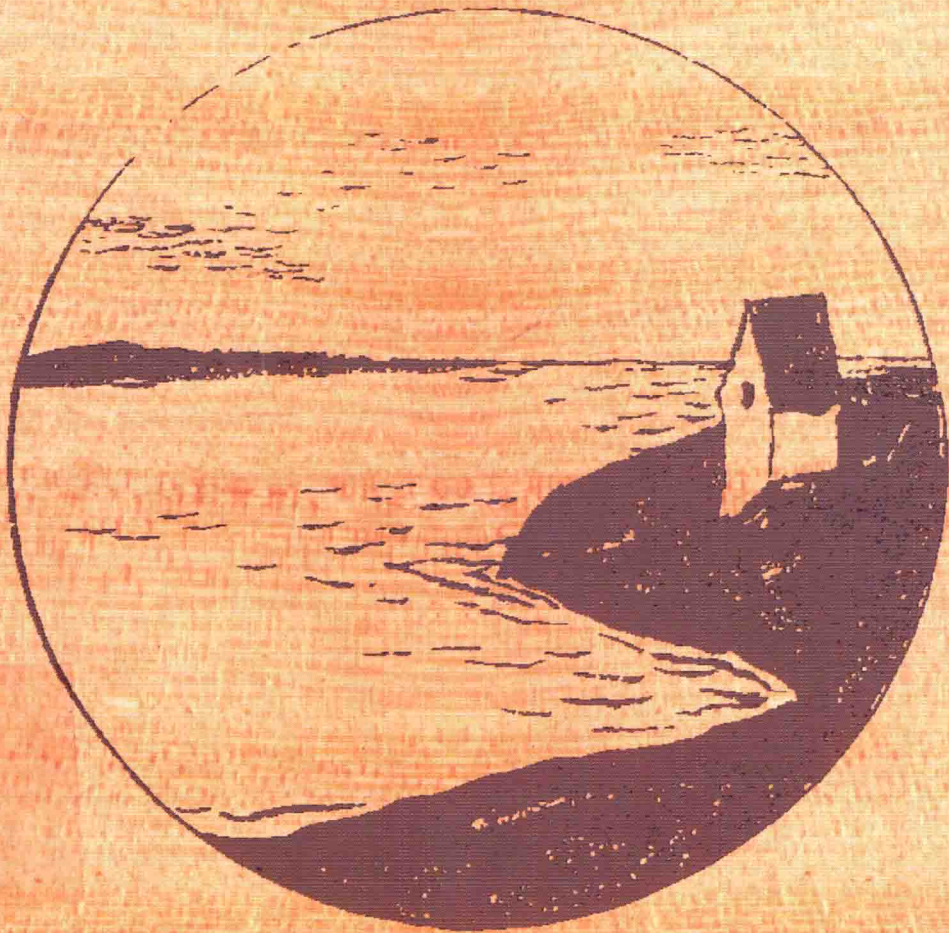


郑乐静 著



温州人在日本

温籍华侨华人口述历史



郑乐静 著

温州人在日本

温籍华侨华人口述历史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人在日本：温籍华侨华人口述历史/ 郑乐静
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308-17518-0

I.①温… II.①郑… III.①华侨—历史—日本②华
人—历史—日本 IV.①D634.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0370 号

WENZHOU REN ZAI RIBEN

温州人在日本

——温籍华侨华人口述历史

郑乐静 著

责任编辑 杨利军

文字编辑 仲亚萍

责任校对 董唯 张培洁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13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518-0

定 价 5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邮购电话：(0571) 88925591；<http://zjdxcs.tmall.com>

CONTENTS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1
第二节 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社会变迁简史	/ 3

上编 离乡背土

——老华侨华人家族口述历史

第一章 家庭团聚之路	/ 27
第一节 我的香港护照	潘鸿江 口述 / 34
第二节 太太是旅法归侨	潘清鸿 口述 / 49
第三节 爷爷在日本	潘红卫 口述 / 54
第四节 从料理店到酒吧	林洪金 口述 / 58
第二章 日裔中国人	/ 67
第一节 我的妈妈是日本人	任家丰 口述 / 74
第二节 中国爷爷和日本奶奶	章祥华 口述 / 83
第三节 团聚在日本	陈城 口述 / 88

下编 落叶归根抑或落地生根

——新华侨华人家族口述历史

第三章 研修生的日日夜夜	/ 101
第一节 想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宋春涵 口述 / 107
第二节 这3年收获很多	XB 口述 / 111
第三节 我是研修团团长	XY 口述 / 114
第四节 研修的生活很单调	MH 口述 / 116
第四章 放飞梦想的就学生和留学生	/ 119
第一节 台湾亲戚帮我来日本	童柏川 口述 / 129
第二节 多个想法,多条门路	叶方荣 口述 / 133
第三节 要有奉献精神	王平 口述 / 141
第四节 人生需要经历很多事	赵友与 口述 / 146
第五节 留学是一种投资	赵明轩 口述 / 151
第五章 IT 技术人员头顶的玻璃天花板	/ 157
第一节 语言问题永远存在	宋辉宇 口述 / 164
第二节 计算机“2000年问题”改变我的命运	黄国庆 口述 / 169
第三节 连接中日 IT 业的桥梁	金喆 口述 / 173
第四节 我的梦想是当老板	林邦 口述 / 186
第五节 出门在外对自己好点	王建中 口述 / 189
第六章 中餐馆的温州菜	/ 194
第一节 300日元中餐连锁店	鲁洁 口述 / 198
第二节 一切为了孩子的前途	史安雄夫妇 口述 / 203
第三节 为了儿子换工作	张晋 口述 / 215



第七章 多元化的温州商人	/ 222
第一节 研修生到经营者的华丽转身	王乡 口述 / 228
第二节 来日本见见世面	韩坚 口述 / 235
第三节 从西班牙到日本	郑才英 口述 / 241
第四节 行走在创业路上	杜祝航 口述 / 248
第五节 日本的技术,中国的市场	高德永 口述 / 255
第八章 侨团领袖	/ 259
第一节 为新老华侨华人搭桥梁	陈今胜 口述 / 263
第二节 以商养会	林立 口述 / 265
参考文献	/ 273
索引	/ 280
后记	/ 282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近年来,“口述历史”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口述历史是什么?它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①

中国学者关于“口述历史”概念的界定存在不同的观点。钟少华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通过人类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把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作为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杨祥银则更广义地将口述史学定义成是运用一切手段(包括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收集、保存和传播即将逝去的声,然后整理成文字稿,并对这些口述史料进行研究的史学分支学科。^②

口述历史正是由于其不同于以往只重视政治史、精英史、军事史等上层社会声音的研究传统,把研究的焦点转向社会底层和普通大众而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口述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自20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以来,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起来。

中国的口述历史研究起步晚于欧美学界,到20世纪80年代才兴起。进入90年代以后,逐渐有口述史著作问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钟少华的《早年留日者谈

① 定宜庄,汪润.口述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② 杨祥银.试论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史学理论研究,2000(3):38.

日本》、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以及何天义主编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等。^① 这些研究多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撰写自下而上的历史,促进了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

然而,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由于受种种条件限制,运用口述历史手法的研究并不多见。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于2004年启动老归侨口述历史研究工程,分别采访天津、山西、广西、海南、广东、福建的300余名老归侨,并在这些采访资料的基础上,出版了归侨口述录系列丛书:《回首依旧赤子情——天津归侨口述录》《风雨人生报国路——山西归侨口述录》《蹈海赴国丹心志——广西归侨口述录》《椰风蕉雨话侨情——海南归侨口述录》《岭南侨彦报国志——广东归侨口述录》《八闽侨心系故园——福建归侨口述录》,^②真实展现了归侨们的心路历程和爱国之情。此外,《“猪仔”华工访问录》^③是基于1963年由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组成的调研组在广东省阳江县(今阳江市)农场对近百名契约华工的采访调查整理而成,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契约华工历史的宝贵的一手资料。

上述这些归侨口述录作为华侨华人口述历史的一个尝试,在弥补文字史料的缺失、丰富侨史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受时间和经费等条件影响,以往的华侨华人口述录大都是在国内进行访谈。黄晓坚等编写的《从森林中走来——马来西亚美里华人口述历史》是为数不多的走出国门、由作者亲自在海外现地采访华侨华人的口述史研究。访谈对象既有精英阶层,亦兼顾普罗大众,讲述了一个个移民家庭的悲欢离合,为我们了解美里华侨华人历史打开了一扇窗。^④

而笔者开始关注日本的温州籍华侨华人群体缘起于多年前在东京的一场偶遇。

笔者祖籍浙江省温州市,于2004年赴日留学。2007年冬天里的一天,笔者在东京街头偶遇一位日本老人,当他得知笔者是来自温州时,深深地鞠了个躬,说道:

① 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张晓.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何天义.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济南:齐鲁书社,2005.

② 林晓东,张秀明.回首依旧赤子情:天津归侨口述录.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林晓东.风雨人生报国路:山西归侨口述录.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林晓东.蹈海赴国丹心志:广西归侨口述录.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林明江.椰风蕉雨话侨情:海南归侨口述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林明江.岭南侨彦报国志:广东归侨口述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林明江.八闽侨心系故园:福建归侨口述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③ 刘玉遵,黄重言,桂光华,等.“猪仔”华工访问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④ 黄晓坚,陈俊华,杨姝,等.从森林中走来:马来西亚美里华人口述历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对不起。”对于老人的这一举动，笔者一头雾水，不知所措。老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你们温州山区的人来东京做苦力，不幸遇难了，我为这件事情向你们温州人道歉。”那一刻，笔者为自己身为在日温州人的一员却不知道自己祖辈的历史而感到羞愧。于是从那以后，笔者就开始潜心研究日本的温州籍华侨华人群体。当笔者于2009年拜访日本温州总商会，希望能在调研方面得到他们的协助时，会长林立先生马上表示非常支持。林会长说总商会很早就开始酝酿建立“在日温州人档案”，只是商会事务繁忙，尚未有专职人员来做此事。在会长的协调下，总商会成立了“在日温州人华侨史编写委员会”，由笔者及其他3位在日温州人负责调研、收集资料等工作。2015年，《温州人在日本——温籍华侨华人口述历史》作为“日本浙籍华人调查与研究”项目的组成部分，得到了宁波大学浙东文化与海外华人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从2009年至2015年，笔者走访了近百名活跃在各行各业的在日温州人，聆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生活。

本书选取了不同行业、不同时期赴日的32位温州人的口述，试图原汁原味地展现温州人在日本的奋斗历程。由于记忆的不可靠性，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一直以来受到学界的各种质疑。笔者采取口述材料和其他资料相互佐证的方法，在尽量真实再现采访录音内容的基础上，对口述的失真失实之处、记忆偏差之处以及谈话中所出现的相关历史事件背景加以适当的校正性注释。口述多为口语表达，整理时尽量保留其原汁原味，仅修改语病、口误等不当之处。本书的采访使用温州方言、普通话和日语进行，采访稿则统一用汉语表述。基于研究伦理，本书对部分人名、学校名、企业名及地名做了匿名处理。另外，为便于分析，本书对部分日本机构、法规、政策等的日语名称予以保留，不做翻译，仅在需要时加注说明。由于本人学识有限，书中有诸多不足之处，恳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作为第一部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口述录，虽囿于本人水平与精力，不能全面涵盖各行各业，但仍希望拙稿能起抛砖引玉之效，殷切地期待海外华侨华人的口述历史研究能在更广和更深的层面上展开。

第二节 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社会变迁简史^①

温州地处浙江省东南沿海，是中国著名的侨乡之一。据2015年温州市基本侨

^① 由于丽水市青田县在历史上曾一度隶属于温州，谈到温州华侨华人史就不能不提到青田人，因此本书中的温州华侨华人不专指现在的温州市的华侨华人，还包括青田县的华侨华人。

情调查^①显示,温州市是浙江省内海外华侨华人最多的城市,共有 68.89 万人,占 34.1%。也就是说在海外的浙江籍华侨华人中,每 3 个人中就有 1 个温州人。温州人侨居海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咸平元年(998 年),温州人周仁随商船赴高丽经商,成为温州华侨的先驱。^② 移居海外的温州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只有 3.5 万人,改革开放前也仅 5 万人,现今的海外温州籍华侨华人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移民的新侨,占总人数的 85% 以上。温州籍华侨华人在海外呈现“全球分布,地区集聚”的特点,80% 左右聚居在欧洲和美国。

《温州华侨史》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温州华侨华人史分为三次高潮期。^③ 第一次移民潮始于一战后至 1923 年。其主要移居地为日本,移居者以永嘉、瑞安等地的山区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主要在日本从事搬运煤炭、修筑铁路等体力劳动和青田石等小商品的贩卖活动。第二次移民潮是从 1929 年至 1937 年。由于 1923 年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在地震后的混乱中温州劳工惨遭日本军民屠杀,大部分幸存者被遣返回国。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温州后,由于对日本怀有巨大恐慌心理以及日本排斥华工的政策日趋严厉,温州人转向赴东南亚和欧洲谋生。在东南亚的温州人中,一部分人从事木工行业,一部分人则在橡胶园、矿山等地做工。去欧洲的温州人以行商为主。因国际形势巨变,日本侵华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此次移民潮的持续时间也不长,很快走向低谷。第三次移民潮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走向世界各国。此次移民潮中的出国人员构成以及出国目的等均不同于之前两次以劳工和小商贩为主的移民潮。继承家业、家族团聚、海外创业、国际婚姻等移民动机占多数。

纵观温州华侨华人史,不难发现,日本因地理位置相近而颇受温州人青睐。温州地区出现的第一次出国热就是涌向日本。另外,近年来随着旅欧温州人的规模 and 影响力日益增强,温州移民现象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④ 学界掀起了一股旅欧温州人研究热,然而却鲜有学者研究旅日温州人群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日的旅日温州人群体与旅欧温州人群体如此不同?

① 唯敏.温州侨情详细数据新鲜出炉.温州日报,2015-01-08(11).

② 温州华侨华人研究所.温州华侨史.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23.

③ 温州华侨华人研究所.温州华侨史.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16-17.

④ 关于旅欧温州人的研究请参照:李明欢.“相对失落”与“连锁效应”:关于当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社会学研究,1999(5):83-93;王春光.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徐华炳.区域文化与温州海外移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2):44-52;夏凤珍.互动视野下的海外新移民研究:以浙江侨乡发展为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笔者试将日本的温州籍华侨华人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期（19世纪以前）、繁荣期（20世纪初至1923年）、低迷期（1924年至1977年）和新时期（1978年至今）。

（一）萌芽期（19世纪以前）

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一直保持着经济文化交流。日本学界一般认为日本的华侨华人社会开端于16世纪下半叶的长崎开港（1571年）。^①1635年，德川幕府发布第三次锁国令，禁止日本人出国，同时也禁止外国人来日本进行贸易，唯独中国人与荷兰人例外，并限定长崎为唯一的贸易口岸。到17世纪上半叶，日本的长崎已经形成以“唐四寺”^②为核心的早期华侨华人社会，主要由贸易商人、船主、船员、僧侣、儒士等组成。浙江人作为当时的华侨华人社会的主要同乡团体——三江帮的重要成员，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形成伊始，就非常活跃。而关于温州人是何时到日本的，并无定说，只能在文献资料中找到些零星记录。

据《温州华侨史》记载，在唐代，温州和日本以文化交往为主，贸易往来次之，从温州运往日本物品主要是经卷、佛像、佛画、书籍、药品和香料。宋元时期，温州造船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与日本的贸易活动。从元末明初至1632年，倭寇不断侵扰温州沿海长达260多年。进入清朝，由于海禁、迁界等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沿海地区的人们被严禁出海。温州人移居海外被迫中断。^③

（二）繁荣期（20世纪初至1923年）

到19世纪末为止，移居海外的温州人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个体移民为主，而大规模的集体移民始于一战前后，其主要去向国就是日本。

随着日本经济变动和移民政策的调整，在这一时期温州人在日本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历史变迁进程，笔者又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形成阶段（一战结束以后至

^① 关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出现，日本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形成于16世纪下半叶的长崎开港（1571年），另一种观点认为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的日本开国（1854年）。過放. 在日華僑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変容——華僑の多元の共生. 東京：東信堂，1999：21.

^② 1612年，日本政府实行禁止天主教政策，早期的旅日华侨华人为了表明信仰，免受株连，纷纷兴建寺庙。1623年三江帮（江西、浙江和江南，江南即现在的江苏和安徽）建造兴福寺，1628年泉州、漳州帮建造福济寺，1629年福州帮建造崇福寺，1678年广州帮建造圣福寺，统称“唐四寺”。这些寺庙不仅是华侨华人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起着联系同乡，丧葬祭祀，调解仲裁的重要作用。

^③ 温州华侨华人研究所. 温州华侨史.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21-25.

1921年)、兴盛阶段(1922年至1923年8月)和衰退阶段(1923年9月以后)。

1. 形成阶段(一战结束以后至1921年)

一战期间,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得以迅猛发展,工厂和企业普遍缺乏劳动力。而此时的温州地区,由于战乱和苛捐杂税,民众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瓯海、瑞安等地的部分山区,由于可耕地面积极少,当地的山农大多以种植番薯为生。据《温州华侨史》记载,瓯海区老归侨陈崇帆说:“我去日本谋生之前,全家十几口,仅有两亩山田与1000株番薯藤园,终年劳作,不得温饱。”^①当得知日本有赚钱机会时,这些穷苦的温州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生计,纷纷踏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温州人之所以选择日本,除了中日经济差距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日本政府根据相互主义原则,自1918年起对中国人入境实施免持护照或国籍证明的政策。1918年1月24日,日本政府颁布了内务省令第一号《有关外国人入国的规定》。^②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日本人进入中国境内免除其出示护照或者国籍证明,因此日本政府根据相互主义原则,在该省令中明确规定给予进入日本境内的中国人同样的待遇。该规定的出台,为中国人东渡日本提供了政策层面的便利性和可行性。据笔者采访的一位旅日温州老华侨回忆:“我爷爷来日本那时和现在不一样,不需要护照。只要和在日本的人联系上,买张船票就能过来了。”^③

其二,相比去欧洲而言,赴日费用不高,且相对安全。当时从中国到日本的船票约为10至15银元,仅为去欧洲的船票的5%,^④一般民众都负担得起。一位旅日归侨说:“当年东渡日本谋生,旅费并不高,只要卖两分半山田或者一头牛就够用。”^⑤另外,航行途中的安全性也是需要考虑的要素之一,正如一位旅日老华侨的孙子回忆:“在我爷爷那个年代,比起去欧洲,来日本更安全。”^⑥在那个以轮船为主要长途交通工具的年代,航海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温州人首选地理位置近、航程时间短的日本作为其谋生地。

① 温州华侨华人研究所.温州华侨史.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30.

② 外国人入国ニ関スル件.官報,第1641号,1918-01-24.

③ 摘自笔者于2010年1月23日在东京都采访旅日浙江籍老华侨第二代P氏的访谈笔记。

④ 比如,当时上海至神户的船票为13元5角至15元4角。申报,1923-07-17.

⑤ 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东瀛沉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6.

⑥ 摘自笔者于2009年11月26日在静冈县采访潘鸿江的访谈笔记。



其三,赴日中介服务业兴盛。由于市场需要,上海和温州地区出现了专门将温州人送至日本的“包客”。在上海,一般是通过商店或旅馆店员,宣传在日本行商如何能赚钱,募集到大批赴日卖雨伞等日用品的温州人。包客在包办一切赴日手续的同时,收取不菲的费用。“上海至门司的三等船票为10块半银元,但是应征者每人必须支付14银元,其中的3块半为手续费。”^①为了招募劳工,一些日本工头和中国工头联手直接在温州设立劳工招募点进行招工。他们夸大宣传,说在日本有大量工作机会,待遇优厚,以此召集了大批劳工。但是由于日本的移民政策不允许非熟练劳动力入境,所以这些包客让劳工佯装成小商贩混入日本境内,与此同时收取昂贵的费用。^②

就这样,一批又一批的温州山区农民和手工业者怀着各自的“日本梦”踏上东渡之路,在异国他乡开始了他们的奋斗史。

2. 兴盛阶段(1922年至1923年8月)

温州人主要从门司、大阪、神户、横滨、名古屋等港口上岸,其总人数在1922年达到顶峰。据《晨报》数据显示,1922年旅日温州劳工和小商贩多达5000余人,^③而当时的旅日中国人总数仅为16936人。由此可见,旅日温州人总数约占旅日中国人总数的30%,成为举足轻重的一大移民群体。由于日本学术界将华工排除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之外,所以,旅日中国人总数很有可能并未将温州劳工的人数包含在内。倘若如此,那么1922年在日中国人总数应为21936人左右,温州劳工和小商贩所占比例虽降至20%左右,但依旧是个不小的数字。

这个时期赴日的温州人多以青壮年男子为主。《共济》中附有一张老妇人照片,底下注明:“华工中本无女子,此老妇因寻儿子只身来日,其冒险精神大可表彰。”^④可见,在那个年代携带家眷出国者几乎没有。

温州人主要作为劳工和小商贩在日本谋生。小商贩大多贩卖雨伞、青田石等浙南特产小商品。其中有些人因所卖商品销路不好,改卖六神丸、人参糖、樟脑丸、

① 福冈県知事安河内麻.渡来支那人ニ関スル件.大正十二年10月2日,高秘第20956号,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 MT.3.9.4.121: 443-444.

② 大阪府知事土岐嘉平.不正入国關係支那人ニ関スル件.大正十二年7月23日,高秘第□167号,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 MT.3.9.4.121: 308-310.

③ 晨报,1923-12-07.

④ 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共济,1923: 9.

草鞋、钱包以及自来水笔等。^① 他们大多是采取提篮叫卖的形式，分散在日本各地，在长崎、门司、神户、大阪、名古屋、东京，甚至是北海道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最兴盛的时候，其人数多达 3500 人以上。^②

值得一提的是，小商贩和劳工的职业划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许多小商贩由于生意好，到日本后商品很快就售罄，在等待商品从中国运来的时候，也会加入劳工队伍。或者有些人经商不利，干脆从事体力劳动，糊口谋生。所以，华工中有一部分是由小商贩转变而来的。

而大部分去日本的温州人是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工。20 世纪 20 年代初，随着日本城市化发展，铁路、港口、电信、水利等工程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为华工提供了诸多就业机会。他们从事的工种主要为挑煤工、挖土工、工厂工和杂工等。除了能吃苦耐劳之外，低廉的工资也是温州劳工容易获得工作机会的原因之一。1922 年至 1923 年，华工的日工资约为 2 日元，比日本劳动者低 20% 至 30%。^③ 比如，挑煤工的工作时间是早上 7 点至晚上 5 点，日工资为 1 日元 70—80 钱至 3 日元 40—50 钱不等。仅在东京一处，从事挑煤的华工人数多时达 900 人。挖土工的日工资为 2 日元，被中国工头扣去 70—80 钱，实际所得为 1 日元 20—30 钱。工厂工一般在铁工厂、玻璃工厂、镀金工厂、铅笔工厂和自来水笔工厂等处工作，其人数在 300 人以上，月工资为 40—50 日元。另外，失业者或者无固定职业者，会去从事拉车、修路等不固定的工作，统称为杂工，人数不多。^④

劳工主要分布在东京、神奈川、名古屋、兵库等地方。而且在各个城市中，他们又多群居在工地附近的贫民窟。比如在东京，他们主要聚居在南千住町、三河岛町和大岛町等地。其居住环境非常恶劣，往往是 10—15 人挤在一间屋里，一天的房费加其他费用为 0.15—0.18 日元。^⑤

旅日华工群体规模的不断壮大，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就是和日本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日本从 1920 年起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 1922 年

① 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共济，1923：13—14。

② 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东瀛沉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40。

③ 阿部康久，1920 年代の東京府における中国人労働者の修業構造と居住分化，人文地理，1999(51)：32。

④ 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共济，1923：11—12。

⑤ 大阪府知事井上孝哉，支那労働従事者ニ関スル件，大正十二年 1 月 20 日，外秘第 432 号，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 MT.3.9.4.121：645—660。



以后,日本国内的兵工厂、造船厂等纷纷出现了大量失业者。许多日本劳动者将失业或者害怕失业的情绪转向了华工。他们认为,正是华工以低廉的工资,夺取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因此,日本各地相继爆发了多起日本劳动者和华工的冲突事件。比如,1922年10月,东京隅田川沿岸的300余名搬运工聚集到警视厅外事课请愿,要求遣返他们的竞争者华工;1923年5月,东京本所深川的工头对他所负责地区的工厂提出要求,要求工厂不要雇佣华工来搬运煤炭;1923年7月,在千叶县北总铁道株式会社从事铺设铁路轨道工作的日本劳动者集体发起了驱逐华工的运动等。^①

虽然华工也是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和当时主流的华侨华人社会处于一种互不干涉的平行状态,被置于边缘地位。而在整个日本社会,他们又生存在职业构造的最底层,不时面临着来自周围的歧视和排斥。因此,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孤立无援的华工便成了替罪羔羊,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侵犯,急需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社团组织为其维权。但是华工们每天为了生计而奔波,遇到不公平待遇多采取忍气吞声的方式息事宁人。加之华工文化水平不高,在组织社会运动方面毫无经验,因此迟迟没有组建任何社团。所幸,华工的处境引起了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注意。以王希天、王兆澄等人为代表的留学生为了改善华工的困难处境,竞相奔走,于1922年在东京设立了“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并在京都、大阪和名古屋设立分会,积极开展对外交涉,保护华工华商权益。至此,旅日温州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团体。

3. 衰退阶段(1923年9月以后)

温州人从一战后开始东渡日本,其人数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加之1922年在旅日中国留学生的帮助下,加入了以维护华工华商权益为目的的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一个规模巨大的温州人社群在日本已然形成。但是,1923年9月的关东大地震却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关东大地震,给旅日温州人社群带来了重创。据统计,地震前在横滨的中国人大约有4600名,在东京的中国人大约有4500名。^②地震后,横滨的中国人中死亡和去向不明者达到2000多人,大部分幸

^① 法政大学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日本労働年鑑第四卷,東京:法政大学出版社,1923:403-404.

^② 在东京的约4500名中国人中,约2000名为华工。本邦変災並救護關係雜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I.6.0.0.5-2:98.

存者逃难到京都和大阪。而在东京的中国人却祸不单行，除了蒙受天灾之外，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惨烈的人祸。日本军民趁地震后的混乱，对华工进行了集体屠杀。受害者中绝大部分正是来自温州地区的劳工。当时的温州旅沪同乡会向中国外交部提交的《日人惨杀温处侨胞调查表》^①详细记载了受害者的姓名、年龄、出生地以及被害情况。在这场大屠杀中，遇难的温处籍^②华工多达 700 多名。^③

从 1923 年 9 月中旬开始，大地震的幸存者被陆续送回中国。据 1923 年 11 月 1 日的统计，到 10 月底为止，被送回的商人和劳工为 3677 名，学生以及其他身份者为 454 名，合计为 4131 人。^④随着大批中国人的回国，1923 年在日中国人总数也随之剧减到 12843 人。由此可见，曾作为旅日华侨华人社会的一大组成部分的温州籍华工华商社群，在关东大地震之后，或遭杀害，或被遣返，以 1923 年 10 月为限瞬间瓦解。

（三）低迷期（1924 年至 1977 年）

笔者根据所掌握的现有史料，尚未发现 1923 年的屠杀劳工事件之后，有温州人大规模移民日本的记录。^⑤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这不仅与大屠杀所造成的恐慌心理有关，更重要的是日本排华政策的强化。

首先来看大屠杀后的恐慌心理。日本学者仁木富美子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深入旅日华工的祖籍地走访幸存者。在被问到为何后来不再有人去日本做工时，

① 「日人惨殺温处僑胞調查表 1」(1923 年 11 月 8 日)、「日人惨殺温处僑胞調查表 2」(1923 年 12 月 6 日)、「日人惨殺温处僑胞調查表 3」(1924 年 5 月 5 日)。今井清一，仁木ふみ子，関東大震災下の中国人虐殺事件，東京：明石書店，2008：625-663。

② 温州和处州，即现在的温州市和丽水市。

③ 关于死伤华工的人数，最早是由侨日共济会的王兆澄基于实地调查，公布于《民国日报》(1923 年 10 月 15—17 日、20—21 日)。仁木富美子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多次深入温州和丽水山区调查，增加了不少遗漏的遇难者信息。近年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关东大地震屠杀中国人劳动者追悼会执行委员会”发起了寻找温州、丽水及其他地区遇难者后裔的活动，又新增几名遇难者信息。

④ 变災及救済關係雜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記録 MT.6.3.1.8-17-17。另外根据资料的不同，被遣送回国的人数可能有一定的出入。据《温州华侨史》的统计，1923 年 9 月 17 日到 11 月 18 日，被遣送回国的温州人为 4445 名。

⑤ 笔者在 1923 年 10 月之后的外务省记录中，依旧零星地发现了几件日本各地海关禁止温州籍华工入境的报告。虽然人数非常少，与地震前的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被禁止入境的规模无法相比，但是这些史料仍能说明，在地震的影响告一段落后，依旧有一些和日本尚有联系的小商贩以及有冒险精神的华工前往日本。



幸存华工告诉她：“在那件事情之后，太可怕了，所以大家都不敢去日本了。”^①经历过大屠杀的华工幸存者是九死一生才得以回国，所以很难想象他们自己以及同乡人还有勇气再次去往日本做工。

其次再看日本政府如何在政策层面加强排华力度，杜绝华工入境。1924年4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的一份报告书中介绍了日本各地政府判定华工禁止入境的一系列基准。^②其中的大部分判定依据偏指温州人，比如：依据一，出生地和入境后的去往地。根据以往的经验，温州人中体力劳动者为多，入境后去往大阪市冈町、东京三河岛町、名古屋御器所町等处的人多为劳工。依据二，外貌着装。体力劳动者一般体格比较健壮，肤色为浅黄或者黝黑，头发不干净。依据三，学历智力。劳工多为文盲，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即使佯装成商人，也不具备任何商业知识。依据四，携带物品。劳工一般会随身携带他们在日本生活所需的简易日用品，以及劳动工具。

从以上规定可以窥见，大地震后，日本各地均加强了限制华工入境的力度。因此，赴日的温州人也随之日益减少。特别是1927年的昭和金融恐慌和1930年的昭和恐慌后，日本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对劳动力的需求骤减。而中日政局也发生动荡，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引发大批旅日华侨华人回国避难。随着中日关系恶化，日本于1939年公布了内务省令第六号《关于外国人的入境、滞留以及遣返》，严格限制中国人入境。因此，从1923年9月至20世纪30年代，赴日的温州人越来越少，他们转向去东南亚和欧洲等地谋生。从1930年到1939年为止，移居日本的温州人仅为48人，而去往东南亚的为346人，去往欧洲的为246人。^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是日本政府在1952年与台湾当局签署了《日华和平条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因此，直至1972年中日两国在北京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联合声明》，才结束了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① 摘自笔者于2010年9月9日在埼玉县采访仁木富美子的访谈笔记。仁木富美子(1926—2012)，日本劳动运动家，曾担任“关东大地震受难华工悼念会”负责人、温州市山地教育振兴基金会副会长，致力于关东大地震后残杀华工事件研究。

^② 内務省警保局外事課。支那人労働者取締狀況。大正十三年4月，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記録MT.3.7.1.5-1：1-24。

^③ 温州华侨华人研究所。温州华侨史。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63。